

共青团“学社衔接”互动仪式模型构建及实施路径 ——从情感治理的视角

■ 贾飞祥 张天雪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管理学院,浙江温州325003;浙江师范大学 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浙江金华321004)

【摘要】随着共青团“学社衔接”工作的持续推进,团员青年情感需求在“技术治理”过程中愈发突显。面对基层团组织“学社衔接”工作中的现实困境,运用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理论,构建“学社衔接”互动仪式模型,设计情感化的毕业生团员“学社衔接”互动仪式,柔化共青团“技术治理”带来的张力。从情感治理视角提出个体情感回应、消极情感释放、群体情感认同、优质社群建立、社会情感归属、有序社会参与等措施,增强团组织亲和力。

【关键词】共青团 互动仪式链 学社衔接 情感治理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21.04.006

一、问题提出

共青团“学社衔接”工作是“十四五”时期推动青年社会融入的重要抓手。2020年,涵盖358.4万个基层团组织、7320.3万名共青团员的“智慧团建”基础数据库基本建成,共青团规范化建设持续推进,高校毕业生团员通过“学社衔接”落户社会领域团组织。“学社衔接”是团中央依托全国“智慧团建”管理系统开展的高校毕业生团员电子档案转入社会领域团组织的过程;是学校和社会共青团工作相衔接、团员理论结合实践、服务社会的重要方式。自2019年共青团实施“学社衔接”以来,团组织在队伍建设、组织活力提升、解决团员失联等方面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全国高校毕业生团员的“学社衔接率”保持在85%以上。同时,基层团组织面临转接主体角色迷失、转接流程情感匮乏、转接后的互动式微等困境。共青团改革前,由于存在“全员皆团员”的情况,导致团员与非团员缺乏边界,团员身份荣誉感缺失,不重视转接工作等现象。同时,基层团组织在追求“学社衔接率”时,由于过于追求技术化,忽略毕业生团员的情感因素,导致团员在心理上感觉被学校“驱赶”,被社区“拒绝”。另外,大量团员转入社会领域的“流动团员团支部”,团员与团组织之间互动式微,产生另一种“失联”。新时代青年群体拥有全新的情感样态,随着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推进与共青团信息化、技术化、科学化的改革,团员青年的情感需求在“技术治理”过程中愈发突显。

收稿日期:2021-05-20

作者简介:贾飞祥,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现代管理学院讲师,团总支书记,主要研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张天雪,浙江师范大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特约教育督导员,主要研究教育政策与管理。

基金项目:本文系浙江省智能教育技术与应用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浙江省教育政策数据采集和分析”(课题编号:jykf210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情感是建构社会秩序的核心元素,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关键力量,人类的独特特征之一就是情感的依赖^[1]。情感也是国家治理体系里不可或缺的元素,中国共产党在发展与壮大的历史进程中,重视“群众路线”“民心”与“舆情”等情感要素,其组织形式、意识形态、符号体系都有显著的情感特征^[2]。在社会领域,情感能柔化国家治理过程中的权力结构,增强社会成员的认同感^[3]。同时,情感是社会传播的重要途径,是社会活动的重要变量,也是一种全新的动员方式^[4]。新时代的共青团,在服务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方面面临全新的挑战^[5],构建情感化的程序来辅助“学社衔接”、柔化“技术治理”过程中的张力显得尤为必要。本文基于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理论,通过模型的构建,探索共青团在“学社衔接”过程中情感治理的路径。

二、理论基础

情感研究成为一门新兴学科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经过大量理论与实证的研究,到21世纪,情感社会学已成为微观社会学的前沿。乔纳森·特纳(Jonathan H.Turner)与简·斯黛兹(Jan E.Stets)在其著作《情感社会学》中对情感社会学的发展脉络做了系统梳理,详细分析了情感的拟剧理论、仪式理论、符号互动理论与社会建构等七种理论的研究现状及其内在关联^[6]。情感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有着重要地位与意义,早在社会学的古典时期,情感论题一直都是学者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对象。“社会学之父”孔德(Auguste Comte)的情感研究起步较早,他提出“情感是社会学研究必不可少的部分”,而且强调“感情高于理性,感情高于智慧”,社会秩序的重建需要提升民众的利他主义情操^[7]。涂尔干(Emile Durkheim)在孔德的基础上,通过对积极情绪和礼仪的分析开启了情感研究的理论构建。他对社会团结的促进条件进行了深入研究,构建了团结的微观基础模型,提出通过转换情感产生的“道德团结的机制”是社会团结的重要因素,为后续的情感理论研究者带来了启发^[8]。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是涂尔干理论的继承者,也是“互动仪式”一词的提出者。他将“文化脚本”融入涂尔干的思想里,提出了“邂逅”(encounter)概念,他认为“邂逅”是互动的的基本元素,分为认知的集中、相互的沟通、交互最大化、团结情感的产生、仪式与标记、纠正机制六个模块,同时对情感动力机制进行探讨^[9]。霍赫希尔德(Arlie Hochschild)结合戈夫曼的分析框架与马克思的异化(alienation)思想提出了“情感劳动”(emotional work)与“情感毅力”(emotional stamina)概念,并对戈夫曼关于情感表达的描述进行了补充。通过研究指出,情感劳动群体可以通过对自身的情感管理服务于社会情境,甚至改变自身的情感状态^[10],其著作《情感整饰:人类情感的商业化》是情感社会学成熟的标志^[11]。

“情感”与“治理”的关联由来已久,中西方学者通过对情感驾驭、建设以及运用的研究,探索其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作用^[12]。情感治理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道德与人情的元素在国家的治理体系里普遍存在;现今我国的社会治理方式受西方“理性”思想的影响深远,过于技术化,存在忽视情感的现象^[13]。近年来学者们对理性化、技术化治理进行了反思,开始探索情感的价值,逐步将情感纳入国家治理的范畴,并作为关键维度进行创新实践^[14]。我国的情感治理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学领域,国内学者成伯清对社会建设的情感维度、公共情感的变迁、当代情感体制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情感社会学论述都做了深入分析,对中国社会的情感问题进行了初诊^[15]。学者何雪松对情感治理做了界定,情感治理是指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立足于理性,以人情民意的可接受度为界限,寻找“法、理、情”之间的平衡,制度化地回应民众的情感诉求,建构治理主体与客体之间情感联结的过程;治理过程分为微观的个体情绪、中观的群体心理与宏观的社会心态三个层次^[16]。学者文军(《情感社会学》的中文译者)强调社区治理要重视“人”的情感维度,在治理中加入情感技巧,才能体现我国“以人为本”的治理要义^[17]。学者田

先红根据对象与场景的不同,将情感治理分为基础性的原生型治理与策略性的工具型治理两种类型,并强调治理主体的制度创新^[18]。简而言之,情感治理是指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立基于理性,使用情感技巧制度化地回应民众的情感诉求的过程。目前在我国的教育领域,高等教育的治理有着工具理性主义倾向^[19]。情感机制在教育治理过程中的作用开始被学者们关注^[20]。教育在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需要情感来支撑,人的情感和价值观的发展是教育过程中极为关键的部分^[21]。学校的情感互动比社区更为密集,因此在校的治理过程中使用“情感治理”的视角尤为必要^[22]。

情感社会学有着丰富的理论体系,意味着情感治理的路径不计其数,本文选取了情感社会学的重要分支互动仪式链理论(Interaction ritual chain)来展开以下研究。互动仪式链理论由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在涂尔干与戈夫曼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互动仪式链理论综合了符号互动论、拟剧论、社会建构论及相关的情感社会学理论,将微观情境作为研究的起点,通过研究分析使其与宏观社会相联结,以此分析社会问题。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指出人类社会由情境构成,微观情境是个人形成的社会关系网,个体通过互动仪式连接到群体中,产生群体归属与身份认同。通过仪式中的互动,人们关注共同的焦点,共享情感,产生情感能量(emotional energy)与共同符号^[23]。互动仪式不同于其他仪式的核心理念在于:个体将短暂的情感投入在成功的互动仪式中能形成持续的情感能量,情感能量是社会互动的根本动力,是“身份认同”与“集体团结”的基础。根据柯林斯互动仪式的一般模型(见图1),互动仪式主要由“仪式的成分”与“仪式的效果”两个部分组成,两者通过“集体兴奋”这个中介因素联系起来。仪式成分包括共同在场、边界、交互的注意力集中和共享心境四个部分,被共同行动、定势礼仪和暂时情绪激活。在注意力集中与共享心境之间有一个循环符号,代表在节奏同步的促进下,共享情感与注意集中相互作用、增强效果^[24]。仪式的效果部分包含“群体团结”“增强的情感能量”“代表群体的符号”与“正义的愤怒”四个部分。“正义的愤怒”一般是指群体内部的道德感。共同符号与道德感的产生之间用虚线箭头指引,代表不是所有的互动仪式都能产生道德感。在仪式过程中,参与者若感觉强迫、乏味、拘谨,甚至想逃离,代表互动仪式失败,并将消耗已积累的情感能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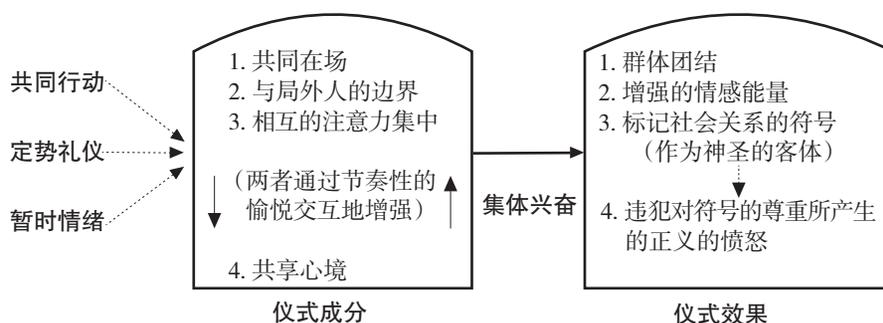


图1 柯林斯互动仪式的一般模型^[25]

其一,“共同在场”产生情感联结。柯林斯强调身体“共同在场”的重要性,参与者的身体“共同在场”是互动仪式的先决条件。当人们身体参与到共同的事件中时,互动仪式才得以呈现。互动仪式的参与者关注共同的焦点时,能及时互动反馈。人类有发达的神经系统,身体的“共同在场”更易于捕捉彼此细微的状态变化,促进互动仪式的成功进行^[26]。共同行为在互动仪式中必不可少,为参与者的亲密交流提供可能。仪式在本质上是一个体验的过程,人们聚集在一起,身体彼此靠近,捕捉共同的关注点和情感联系,产生情感联结,形成互动仪式。情感是黏合剂,能引发群体的强烈联合,对强化社会联结有重要意义,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会强化对

自己有利的情感表达^[27]。

其二,“设定界限”共享情感体验。“界限”的区分是仪式的重要条件,是身份的象征,群体的身份认同需要在与局外人“设定界限”的场所进行。参与互动仪式成员的身份越明确,边界之内“自己人”的集体意识越牢固,仪式的程序越正式,群体“界限”越严谨。中国共产党就是“设定界限”的群体,有严格的准入机制与道德标准,有强烈的身份认同与集体荣誉感,还有群体内部专属的政治活动。身份统一的对象在“设定界限”的场域相互关注,共享情感体验,创造出一种与局外人相区分的边界。同时通过节奏化进程、相互的注意集中和集体兴奋加强这种边界。“界限”并不意味着脱离群众,反而能增加群体内部凝聚力,提升对外吸引力。

其三,“节奏同步”增强情感能量。在互动仪式中,参与者的情绪高度共鸣时,产生共同的节奏。节奏的互动增强参与者的兴奋感,集体越兴奋,群体的注意力越集中,人们越愉悦。同步节奏增强“情感能量”,“情感能量”激发节奏的同步,两者相互反应,促进参与者的共享心境和注意力集中。“情感能量”是内在驱动力,也是互动仪式最终呈现的结果,对群体团结有重要意义。“情感能量”是类似符号资本的一种成本,人们在互动仪式中消耗“情感能量”,同时在互动过程中得到更多的回报。情感在互动仪式中是短暂的,但产出的“情感能量”是长期的,是一种“自信、兴奋、充满力量”的持续情感状态,在各类互动仪式中凝聚储存^[28]。

其四,“群体团结”捍卫共同符号。共同符号是群体的标志物,被成员共同关注和认可,是互动仪式延续的动力。成功的互动仪式中,群体关注共同的焦点产生群体团结,高度团结的群体产生共同符号。符号可以是无形的象征,也可以是物化的标识。在互动仪式的过程中,共同符号能唤起群体成员与集体的关联。集体行动中共同符号的呈现,群体团结会变得更加强烈^[29]。仪式的连带程度越高,群体团结与身份认同感就越强,在相互熟识的群体中,共同符号的稳定性更高,主动参与者的身份认同高于被动参与者。互动仪式运转到一定阶段,群体对共同符号产生强烈认同感,参与者会主动捍卫群体的共同符号,积极主动地维护神圣符号的尊严和荣誉,产生道德感以及对权威的忠诚^[30]。

互动仪式链理论中的“群体团结”理念与共青团的政治属性有着高度契合,“学社衔接”过程中的角色迷失、情感匮乏与互动式微等问题,在互动仪式链理论中能找到破解之道。“学社衔接”是一个富含仪式感的过程,见证了青年团员从学校步入社会的成长历程。“学社衔接”除了在技术层面保障团员电子档案衔接顺畅,也需要情感来联结、仪式来承载。共青团员的入团仪式、成人仪式主要在初高中开展,符合参加超龄离团仪式的团员又集中在社区或者研究生群体,普通高校团员的团内仪式教育开展出现盲区。近年来,学者们在青年研究领域对互动仪式链理论做了积极探索。潘曙雅指出,互联网社群以虚拟在场的方式,通过直播中的实时讨论可以构建互动仪式^[31]。徐明华运用互动仪式链理论分析了当代青年的情感价值与国家认同建构,青年群体在B站(bilibili网站)用弹幕形式构筑起完备的互动仪式,巩固国家观念,深化身份认同^[32]。费芬芳运用互动仪式链理论对青年红色网络教育的路径进行研究^[33]。运用互动仪式链理论构建一个青年大学生团员普遍参与的互动仪式,对提高共青团员政治身份认同,增强政治与组织意识有重要意义。

三、共青团“学社衔接”互动仪式模型构建

在柯林斯互动理论的基础上可以建构共青团“学社衔接”互动仪式模型(见下页图2)。身份一致的毕业生共青团员进入“设定界限”的互动场域,关注共同焦点,共享情感体验,在一系列的节奏连带与情感互动中产生集体兴奋,达到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与向往,突显自身的政治

身份。通过互动仪式形塑团员的国家情感认同,增强团员爱国爱党的情感能量,提高团员的政治生活质量,建立与中国共产党的情感联结,构筑其政治信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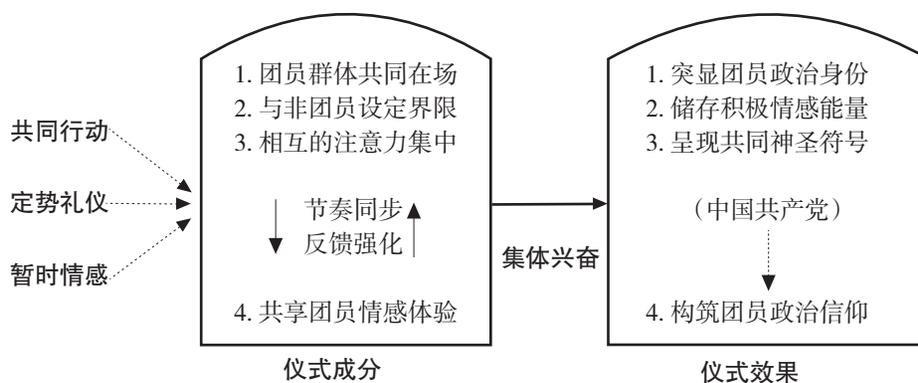


图2 共青团“学社衔接”互动仪式模型

(一)共同“在场”“设限”:突显政治身份

根据共青团“学社衔接”互动仪式模型,“共同在场”与“设定界限”的目的在于提高共青团员的政治身份认同,突显政治身份。进入“学社衔接”流程的团员,在离开校园踏入社会的时间节点,着正装、佩戴团徽聚集在一起,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歌》中建立共同在场的场域,确定团员与非团员的明确“界限”。“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由中国共产党创建并赋予其政治身份,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群团组织离开了政治性就如失去灵魂一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保持和增强群团工作政治性的前提”^[34]。共青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体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助手与后备军;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政党党性青年化的组织机构^[35]。“学社衔接”互动仪式是一个强化团员政治身份的过程,通过正式的转接流程、仪式化的转接形式,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品格和精神传递给团员,使团员遵守团的章程,履行团员义务。团员在“学社衔接”互动仪式中,不仅是对现有团员政治身份的实践,也是对即将成为“社会人”的团员青年政治身份的强化与重新创造。

(二)同步“互动”“共享”:储存情感能量

在“学社衔接”互动仪式中,毕业生团员通过回顾团内经历、畅谈感悟体会、表达进步愿望、分享情感体验等一系列的节奏化互动,唤起团员们的表达热情,推进仪式的深入,储存积极情感能量。在仪式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的寄语》,其目的是让团员青年志存高远,谨记自身的使命。通过上级党组织对团员成绩的肯定,表达对团员的希望和祝愿,促使团员的集体情感涌现。群体团结与情感状态持续的时间,以及群体的共同符号受尊重的时间,取决于情感能量的储备状况。情感能量的产生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通过一系列成功的互动仪式进行储存。柯林斯强调的“情感能量”是一种长期、稳定、系统的社会情感,有高端、中端与末端的曲线,高端情感自信热情,中端情感平淡安静,末端情感消极低沉。高端的情感能量是积极向上的情感体验,能产生群体的团结。在共青团员“学社衔接”过程中,互动仪式的重要作用就是发展共青团员高端层面的情感能量。团组织要着力将情感贯穿到团员的生活实践中,让团员通过参与互动仪式产生共同的关注焦点与情绪,形成群体的情感共鸣,储存积极情感能量。

(三)呈现“团结”“符号”:构筑政治信仰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100年的历史结论^[36]。共青团员的“共

同符号”是中国共产党。随着“学社衔接”互动仪式的推进,团员青年重温“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入团誓词,强化使命信念,增强政治身份认同。团员通过获赠《中国共产党章程》与中国共产党凝聚成政治共同体,呈现群体的“共同符号”。对“共同符号”中国共产党的信仰产生强烈的自豪感、认同感以及道德感。团员群体内部自发抵制对中国共产党不尊敬的行为,激发团员主动维护党的荣誉,产生对党的忠诚。仪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歌声中结束,将爱党的政治信仰与爱国的家国情怀相融合,产生明确的群体团结与强烈的情感能量。共青团“学社衔接”互动仪式旨在将思想政治教育潜移默化融入仪式中,突显“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的政治身份,让共青团团员牢记对团的誓言,加强组织观念,坚定政治信念,储存积极情感能量。通过仪式提高共青团员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构筑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仰^[37]。

团员青年毕业离校后,电子档案通过全国“智慧团建”系统转向社区的基层团组织;与此同时,社会领域的团组织每年要接收来自五湖四海的团员青年。鉴于此,“学社衔接”互动仪式在高校与社区两个层面分为“离”与“接”两部分。高校层面,在团员毕业进入社会的重要时刻,设计毕业生团员“学社衔接”转接仪式,邀请进入“学社衔接”流程的团员以及上级党组织代表参加仪式,将对毕业生团员的美好祝愿融入仪式,增强毕业生团员的政治自信。社区层面,为“流动团员团支部”的团员设计“学社衔接”接收仪式,欢迎进入社会领域的团员,在情感上进行接收与延续,加快团员的社会融入。基于上述分析,参照团中央发布的仪式规定设计了以下共青团“学社衔接”互动仪式流程(见图3),用规范到位的程序严谨顺畅地为离开校园进入社会的团员举行“学社衔接”互动仪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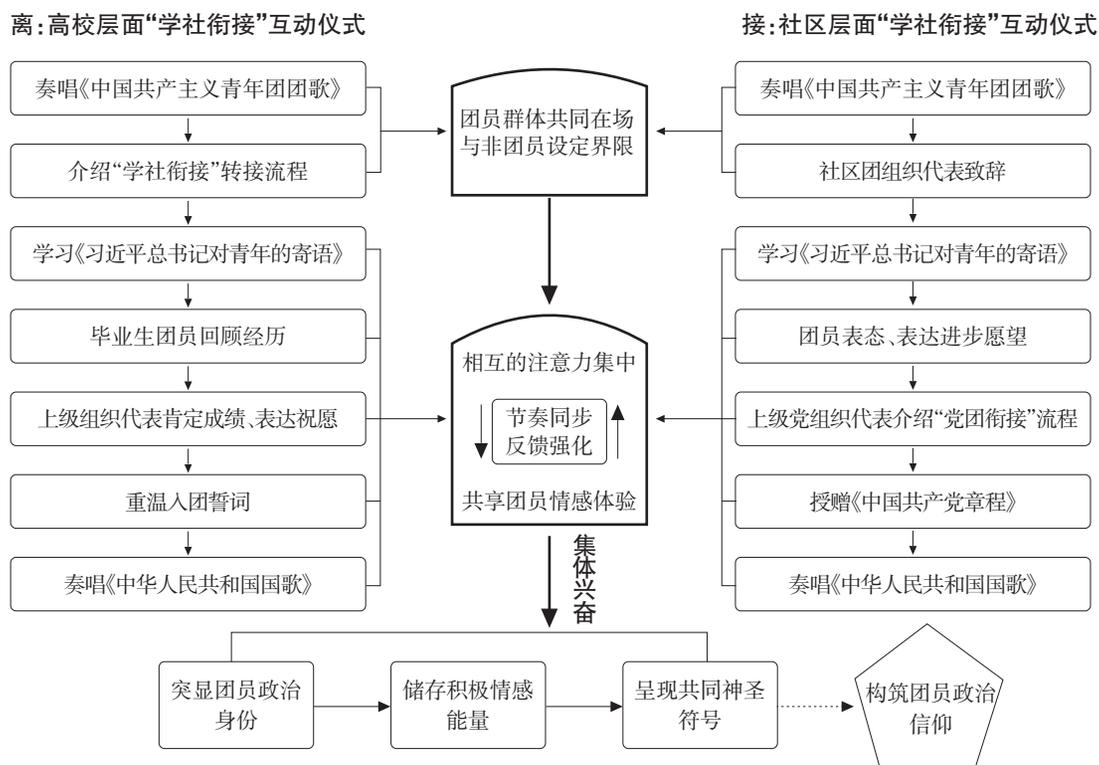


图3 共青团“学社衔接”互动仪式流程图

注:仪式流程设计参照《全国中学生18岁成人仪式规范(试行)》与《超龄离团仪式规定(试行)》。

四、“学社衔接”的情感治理路径

“互动仪式链”理论是情感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在高校、社区之间“学社衔接”的治理上有指导意义。面对基层团组织“学社衔接”过程中面临的转接主体角色迷失、转接流程情感匮乏以及转接后互动式微等困境,情感治理的路径可以从微观层面的个体情感回应,中观层面的群体情感认同、宏观层面的社会情感归属三个视角展开,从而达到释放团员消极情感、建立优质团内社群、团员有序社会参与的目的。

(一)微观层面:个体情感回应与消极情感释放

情感治理的核心要义是制度化地回应情感诉求。尊重与满足团员青年的合理利益诉求是团组织向心度与忠诚度的基础^[38]。互动仪式链理论强调“共同在场”与“节奏同步”,“共同在场”是情感交互的前提,“节奏同步”是情感互动的过程,也是个体需求被回应的过程。在成功的互动仪式中,团员的情感需求是被满足的。团员个体被高度关注,以及情感被不断回应时,能产生积极的情感能量。团组织要重视与团员的情感互动与连接,与团员保持动态联系,实时回应团员的情感需求。互动仪式是回应团员情感需求的有效途径,高校与社区的基层团组织可以通过毕业生“学社衔接”互动仪式的开展,从个体的视角储存高端的积极情感能量,坚定毕业生团员的政治身份认同,提升社会角色的认知,增强积极的情感体验。针对刚刚经过“学社衔接”进入社会领域团组织的毕业生团员,在活动组织策划过程中要重视情感的联结,建立情感的辅助体系,运用情感治理的思维与技巧回应团员的需求,让团员感到被尊重与认可。

除了情感诉求的回应,消极情感的释放也同样重要。研究表明,在参加情感色彩浓厚的活动时,情感因素在理性动机的驱使下,参与者获得了情感表达和释放,对舒缓社会压力起到积极作用^[39]。“学社衔接”是团员的角色从学生向“社会人”转变的过程,角色变化意味着成长与责任,容易产生迷茫、焦虑等消极情绪。团员在“学社衔接”时会遇到各类实际困难,如由于转接过于技术化,使得团员在情绪上产生抵触。经过精心设计的互动仪式,除了能让团员产生政治身份认同,储存积极情感能量;也能让团员感到愉悦、舒适、流畅、自然,从而产生强烈的“情感释放”。一场正式、成功的团内互动仪式产生的情感能量,是与国家层面价值目标的情感联结,是社会层面的美好生活情感体验,是由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生发的道德感,是极力捍卫国家荣誉、爱国爱党的情感能量。通过一系列的“学社衔接”互动仪式储存情感能量,即使空间上没有共同在场,人们通过回忆也能够唤醒这种能量,通过共同符号对情感能量进行重温,就像国旗冉冉升起时,爱国的情感能量就能被唤醒。团组织要持续不断地通过各类互动,储备“学社衔接”团员的积极情感能量,释放消极情感能量,降低焦虑,提高自信,帮助团员缓解各种社会压力。

(二)中观层面:群体情感认同与优质社群建立

中观层面的情感治理注重群体内部的认同与优质社群的建立。在“学社衔接”过程中,高校与社区应开展专属毕业生团员群体的活动,让团员们在群体中建立情感认同;在群体中接受教育、收获成长、向党靠拢,强化主业意识,突显政治功能。针对团员的新情况与新特点,团组织加强组织建设、拓展服务路径、丰富活动载体与内容、创新活动形式、提高组织活力、提升团员先进性,使团员在情感上认同并信任团组织。针对“流动团员团支部”的团员建立形态多样化的社团、兴趣小组等外围组织;关注流动青年,关注薄弱领域,建设新职业、新领域的团支部,使团组织覆盖各个领域,让团员在组织中感受到爱与温暖。建立有影响力的“团”字号、“青”字号等育人品牌。同时,团组织要善用图像化的表达方式,创新运用立体、动态的情感互动形式进行叙述,打造团员饱满的情感体验,从情感视角全面提升组织黏性,提升团员青年的获得感与认同感。

互联网时代的共青团呈现圈层化,传统共青团圈层基数庞大,结构松散,内圈互动高、资源多,外圈机会少、信息散,影响共青团的吸引力和凝聚力^[40]。圈层化代表着精细化、精准化,新时代的共青团要进行圈层的重组再造,扩大圈层影响力,建立有强烈政治属性的优质社群^[41]。在学生群体中,团员与非团员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团日活动与青年活动在学生的概念里均是班级活动,团员的政治属性并不突显。面对转接主体角色迷失与转接流程情感匮乏的现状,建立优质的团内社群是最有效的方式。增强团员身份认同的前提是团员核心圈层建立,有“边界”,群体才能确定根本定位,才能进行思想锻造。随着共青团改革的深入,从严治团的持续推进,团青比例的下降,团员政治素质的全面提升,团员与非团员的界限会越来越清晰,圈层的“边界”愈趋明显。社会领域基层团组织要增强“流动团员团支部”的建设,使“临时团支部”不临时,而成为有深度、有广度、有魅力、有强大情感能量的社群。

(三)宏观层面:社会情感归属与有序社会参与

面对“学社衔接”转接后的互动式微问题,从宏观的社会层面提出情感治理路径。一方面,要提升团员社会的归属感,也就是团员进入社会领域后的“确定感与秩序感”。情感是建构社会秩序的基础性力量,个体通过共享体验、共同记忆、仪式等形式与国家、社会联结^[42]。中国共产党是共青团员情感的最终归属,明确的归属感是团员“确定感与秩序感”建立的最有利因素。毕业生团员“失联”有诸多客观因素,究其原因是其主观上没有坚定的政治信仰。中国共产党是共青团员的政治信仰,对党的向往与强烈的入党意愿是团员群体永不失联的基础。高校团组织在毕业季各类互动仪式中,通过思想引领,提高毕业生情感体验,坚定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同时,团组织在追求“学社衔接率”的过程中,要关注毕业生团员的情感因素,在正式或非正式的场合运用情感的元素,提高团员对组织、对社会、对国家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另一方面,“学社衔接”的情感治理要优化共青团现代化治理体系,加强团员的社会融入,使之有序参与政治生活与社会建设。秩序感的建立,除了在政策、制度上为“学社衔接”保驾护航,更要发挥团组织的主导作用,帮助团员切切实实地融入社会,产生情感上的稳定归属。在“学社衔接”过程中,要用“活”第二课堂成绩单,将饱满的团员电子档案转入社区,使团员的专长、经历在社会能发挥作用,为团员的社会融入与社会参与提供助力。让团员青年在社会深入群众,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提高社会影响力。对于“流动团员团支部”的团员而言,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其最优归属,是其政治参与能力最直观的指标。社区要结合团员在校时的档案,落实流动团员的推优入党制度,打通晋升通道,让团员在心理上被接纳,身份上被肯定,信仰上有延续,情感上有归属。

“学社衔接”是共青团助力国家“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进、推动青年社会参与的重要渠道。全国“智慧团建”系统的技术在不断革新,流程在不断优化,情感治理的路径仍有大量的空白待挖掘。柯林斯互动仪式链理论在共青团“学社衔接”过程中的运用,对提升共青团员政治身份认同、坚定政治信仰、提高团组织活力具有积极作用。学校与社会领域团组织在“学社衔接”的过程中,在服务团员成长成才的实践中,可以尝试运用情感治理的思维与技巧,增强团组织亲和力,提升共青团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贡献度。

[参考文献]

- [1][6][9][10][24][25] 乔纳森·特纳 简·斯黛兹:《情感社会学》,孙俊才 文 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30、23、32-33、64、65页。
- [2] 裴宜理:《重访中国革命:以情感的模式》,李冠南 何 翔译,载《中国学术》,2001年第1期。
- [3][17] 文 军 高艺多:《社区情感治理:何以可能,何以可为?》,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 [4] 周庆安 宁雨奇:《唤醒、愉悦与支配:情感作用下的推特政治传播路径重构》,载《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年第11期。
- [5] 王冬梅:《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共青团的职能定位及实现路径》,载《中国青年研究》,2020年第7期。
- [7] 刘易斯·A.科瑟:《社会学思想名家》,石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0页。
- [8] 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8页。
- [11][15][42] 成伯清:《情感的社会学意义》,载《山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 [12][18] 田先红 张庆贺:《城市社区中的情感治理:基础、机制及限度》,载《探索》,2019年第6期。
- [13] 蓝煜昕 林顺浩:《乡情治理:县域社会治理的情感要素及其作用逻辑——基于顺德案例的考察》,载《中国行政管理》,2020年第2期。
- [14] 汪勇 周延东:《情感治理:枫桥经验的传统起源与现代应用》,载《公安学研究》,2018年第3期。
- [16] 何雪松:《情感治理:新媒体时代的重要治理维度》,载《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11期。
- [19] 张洋磊:《我国高等教育治理的工具理性主义特征分析——以重点大学建设为例》,载《高等教育研究》,2017年第2期。
- [20] 马多秀:《情感教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教育研究》,2017年第1期。
- [21] 刘庆昌:《教育是一种情感实践》,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 [22] 罗阳 刘雨航:《学校情感治理机制探究:现实诉求与行动逻辑》,载《中国电化教育》,2020年第11期。
- [23][26][28][29] 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林聚任 王鹏 宋丽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0、93、87、125、126页。
- [27] Barry Markovsky, Edward Lawler. A New Theory of Group Solidarity. *Advances in Group Process*, vol. 11, 1994, p. 113.
- [30] 邓昕:《被遮蔽的情感之维: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理论诠释》,载《新闻界》,2020年第8期。
- [31] 潘曙雅 张煜祺:《虚拟在场:网络粉丝社群的互动仪式链》,载《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9期。
- [32] 徐明华 李丹妮:《互动仪式空间下当代青年的情感价值与国家认同建构——基于B站弹幕爱国话语的探讨》,载《中州学刊》,2020年第8期。
- [33] 费芬芳 王寿铭:《互动仪式链视域下青年红色网络教育研究——基于网剧〈那年那兔那些事儿〉的分析》,载《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
- [3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青少年和共青团工作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69-70页。
- [35] 刘佳:《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与共青团关系演变的理论逻辑》,载《青年探索》,2021年第2期。
- [36] 郭晓平:《中国共青团史》,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14页。
- [37] 黄志坚 叶子鹏 宋偏超:《政治仪式文本:中国共青团入团誓词的历史沿革、演进规律与时代价值》,载《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
- [38] 李勇:《新形势下高校共青团凝聚力建设研究》,载《中国青年研究》,2017年第6期。
- [39] 陈晨:《共青团的情感动员与凝聚力发挥》,载《中国青年研究》,2019年第6期。
- [40] 王俊 范赟:《高校共青团扩大有效覆盖面的途径研究——一种公共产品供给理论的视角》,载《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
- [41] 陈志勇:《“圈层化”困境: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挑战》,载《思想教育研究》,2016年第5期。

(责任编辑:韩永涛)